

21世纪 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

研讨会论文集

李欧梵

潘耀明

张错

于心武

李锐

傅承得

温任平

杨牧

刘再复

英培安

李爽学

王安忆

陈思和

焦桐

黄子平

星洲日报

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

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萧依钊

美术总监：黄辉聪

责任编辑：曾毓林

叶伟章

曾翎龙

文字编辑：林宝玲

美术编辑：刘诗亭

梁靖芬

出 版：星洲日报

19, Jalan Semangat,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电 话：603-7965 8888

传 真：603-7958 5418

网 站：www.sinchew-i.com

总 代 理：马来西亚大众书局

Popular Book Co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电 话：603-9179 6333

传 真：603-9179 6063

印 刷：CBL Print Press (M) Sdn Bhd

初 版：2003年12月

定 价：RM16

Copyright © 2003 by Sin Chew Daily
All Rights Reserved.

国际书号：ISBN 983-41387-8-4

Printed in Malaysia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海水到處有華人

華人到處有花踪

序

星洲日报集团总编辑萧依钊

跨进 21 世纪，星洲日报即给世界华文文坛献花——《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的宗旨：推动华文文学发展，奖励优秀作家，树立艺术典范。两年一届，每届从全球评选一位仍在创作的华文作家，国籍不限，只要以华文创作。

星洲日报是在拥有主办《花踪》马华文学奖 10 年经验的基础上，以马华为立足点，毅然探向世界华文文坛。《花踪》文学奖一贯坚持透明、公正、独立和创造的原则，已成为马来西亚公认的最高华文文学荣誉。

坦白说，《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有参考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组成和评奖方式。我们邀请了世界华文文坛的 18 位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组成评委会。这 18 位终身评委包括：中国的王蒙、刘心武、王安忆、陈思和、李锐，台湾的余光中、杨牧、焦桐、李奭学、平路，美国的李欧梵、王德威、张错、郑树森，香港的刘再复、黄子平、潘耀明以及马来西的傅承德。评委阵容鼎盛，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每位评委负责推荐一位杰出的作家及他的一部近 10 出版的代表作品。评分标准是作品占 60%，作家的创作总成就占 40%。评委会以淘汰渐进的方式评选，至少 2/3 的评委参加，半数通过才能被评为得奖人。

星洲日报设立《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的消息传开后，在华人世界的文化圈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一般均持欢迎态度，认为华文文学应有自己的权威大奖。中国大陆的网

站甚至以“华文文学为什么由西方人说了算——世界华文文学奖向诺贝尔叫板”为题报导了《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的消息，并猜测我们设立这个奖的目的之一，是挑战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

其实，我们主办《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的目的十分单纯，就像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在宣布设立这个奖项时，曾开宗明义的说，要为世界华文文学做贡献。

一个民族要尊重自己的传统，留下自己的记忆。文学是承继民族传统，留传民族记忆的重要形式。华文文学是不可断裂的中华文化传承的中介。星洲日报作为中港台以外华人地区最大的华文报，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觉有义务去承担文化传承的责任。

评委会经过费时一年多的推荐、初审、复审、决审的慎重严谨的程序，上海作家王安忆以长篇小说《长恨歌》及创作总成就倍受评委肯定，成为首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奖人。评委之一的陈思和在研讨会上称王安忆为“文学中的异数”。在生活中，王安忆能够敏锐地感受到不同思潮的兴迭，吸收主要的时代讯息，她将它融化在自己的观念中通过作品呈现出来。她总是在每个思潮即将没落消褪之前，写出一部比思潮本身更好的作品来。《长恨歌》拥有她对上海文化的掌握和了解，也有她的理性反思和批判。王安忆得奖，是世界华文文学界众望所归。

《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颁奖典礼於 2001 年 12 月 8 日在吉隆坡举行。配合颁奖礼，星洲日报主办主题为《21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的研讨会，在会上发表报告的包括评委和马新作家。本书收集的是这些作家的论文和相关文章，以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奖人王安忆的得奖感言和一些作家对她的作品的评论。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花踪》文学奖出策出力的海内外作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

目 录

ii	序	萧依钊
001	当代华文写作的语言问题	李欧梵
007	对华文文学的三个期望 —— 21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	潘耀明
010	文学奖的争议与执行 ——世界华文文学领域探讨与展望	张错
016	从陈独秀的小说观说起	刘心武
020	本来该有的自信	李锐
025	彩笔昔曾干气象？ ——从载体演变角度，试论文学未来： 一次“通俗入世的思考”	傅承得
030	当前华文文学的另类书写 ——兼及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分众趋向	温任平
042	以后的文学	杨牧
047	华文文学的前景和作家的禅性	刘再复
055	写作与阅读	英培安

065	重访灵山 ——从高行健的小说技巧谈到语言的问题	李爽学
074	在吉隆坡谈小说	王安忆
077	我们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文艺？	陈思和
084	台湾现代诗的朝圣之旅	焦桐
093	“世界华文文学”：一个问题	黄子平
附录一		
101	与张错谈“语言的共同体”	温任平
105	论文之间的对话	温任平
108	宵夜、消夜与夜宵	黄子平
附录二		
112	作家欢迎〈花踪世华文学奖〉	
114	得奖者感言 ——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王安忆	
115	王安忆将生命交给文学 ——陈思和评论王安忆和她的作品	
118	《长恨歌》的手笔罕见可贵 ——李欧梵在颁奖典礼上的赞词	
119	世界华文文学奖与王安忆	艾火
121	《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评审委员简介	
123	〈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章程	

当代华文写作的语言问题

李欧梵

几年前，中国大陆作家王安忆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当地的华文写作有不少批评和洞见，后经现在台湾任教的马来西亚华裔学者黄锦树教授引用和延伸，加上黄教授多年来对马华文学的研究成果，构成一部学术巨著：《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文化 1998 年出版），我读后获益匪浅。

王安忆认为：大陆作家的小说语言口语化，并带有极强的地域特徵，而台湾小说的语言则是汉语技术化，熟字生用，旧词新用，常有变通；前者具“书面感”，后者具“阅读感”；前者可以直接再现现实，后者则是对现实的重新编码。（以上皆见该书第一章，72—74 页）。如果从一个学院的立场来看，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当代大陆作家所延续发展的是五四以降的写实主义传统，而台湾作家的作品则似乎印证了俄国形式主义所谓的“陌生化”的“文学语言”的效果。然而从一个文学史的观点而言，两地的当代文学都先后经历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而后复归本土，作进一步的磨练和转化，所以都注重技巧和语言的自觉性，近年来不少大陆作家，包括王安忆在内——都是此中高手。而对於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反抗，两地也各有千秋。对我

而言，其实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小说是书写语言，它和口语究竟是何关系？这个问题，当年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并没有详论。胡适以为白话文就是书写口说的语言，其实不尽然。我也曾屡次提到：胡适的口号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未能解决文学创作的问题，两者孰先孰后？如何用国语写出文学作品？如何经由文学创造国语？事后看来，这个口号只不过为刚建立的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必须的语言基础——国语——而已。

如果国语的定义，照字面意义是一个国家的语言的话，那么当这个语言早已超越国家的范围以后怎么办？现在，口说的国语在台湾叫作国语（衍用当年国民政府的说法），但在大陆则叫作普通话；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方言，但大部分的方言却不能全部用国语或普通话的书写方式表达出来。

书写的国语和普通话应该叫作什么？中文或华文？（大陆也用汉语这个名词），前者的表面意义是中国人的文字，仍有民族国家的意涵，而后者则似乎指的是散布世界各地华人社区(diasporas)所用的中文，范围较广。我个人认为：在当代的华文世界，中文的多元化已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即便是书写的中文本身也逐渐“杂种化”，因为它受到英文和当地国家的语言的挑战和渗透。对于中国文化的卫道之士，这是中文每况愈下的表徵，然而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角度而言，这种“杂种性”(hybridity)反而是值得推崇的，因为它对于原来祖国和当地国家的语言霸权都构成一种“颠覆”。

然而，这两种态度和提法，都不能解决当代华文写作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当今马华文学的领域来看，则因牵连到政治因素而更复杂。黄锦树在书中引论：在这个地区，“华人和华语（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华语（取代方言而被称为华人的母语）的保存又象征了中华文化可以存续，被看作是中华文化在大马华人中存续的可能条件”（该

书第 111 页)。然而,这只不过代表华教运动史上的第一阶段,目的是争取华文为官方语言之一,但第二阶段只是为了争取华文为官方应用文,并允许华文在华人中小学作为主要的教学媒介,现在已经到了第三阶段,用杨建成的概括,是“确保华小永不变质”(107 页),语言的要求,似乎仅限于华文小学教育。

我对于大马的华教问题,当然是门外汉,只能暂时假设马华的华文教育依然可以训练出一批出色的华文作家。(其实,这已不是假设,而是事实,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屡屡可见)。我最关心的反而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对这一代马华作家,以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华文地区华文作家,所构成的“影响的焦虑”:如果中国大陆作家仍能继承中华文化的传统,马华文学是否只能算是一种传统边缘的半调子华文文学?大陆作家往往看不到中文本身的多元化趋势,而对于白话文的传统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对于其他地区的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中文往往是一番努力后的成果——特别是文学上的书写语言,我甚至还认为:华文的文学写作应该彻底和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分开,而把它作为一种语言上的尝试,如果不能彻底分开的话,那么文学和政治,形式和内容之间则应该构成一种矛盾的张力。我的这个论点不是以族群认同为依归,而是把作家的国际视野列于首位。在当今全球化的影响(也有人说是焦虑)之下,民族国家在语言上的主导地位已经逐渐在瓦解,继之而起的反而是如何容纳文化逐渐多元化的问题;换言之,我认为当代的华文本来就是“杂种”,我们不妨从这个立场出发,来探讨海外的华文创作如何丰富中文本身的内涵,这种尝试,也不必以“中国性”为依归,因为所谓中国性也是多数的。可能不少人会觉得我的看法很极端,且让我举一个我最喜欢引用的例子——西方现代文学的大师卡夫卡——作对照。

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是在捷克的布拉格写成的,用的是德文,但在文体和风格上又和当时德国国内作家所用的德文

有所不同，因为他长年居住在国外，不可能（也可能不愿意）用正宗的德语。他住在布拉格犹太人区里，其“境外德文”也和捷克的官方语言——捷克文——大相径庭，所以他的德文无论从德国和捷克的立场来看，都是一种“少数语言”（Minor language），然而法国的一位著名理论家 Deleuz 却特别著书表扬，认为这种少数语言非但可以颠覆原来的多数语言（正宗德语），而且更可以促进原来语言的民主化。当然，我们可以反驳说：卡夫卡的例子只是一种天才作家的个案，不能概括一切。

那么，且容我再举另一个世界文学的例子。

目前英语世界的作家群中，最出色的已经不是英美白人作家，而是出身於前英国殖民地的有色人种作家，今年得诺贝尔奖的英籍印度人但却出生在千里达的奈保尔（V. S. Naipaul），即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我看过一两本他的著作，令我最佩服的是他的英文造诣，远在英美作家之上。当然他常年住在英国，和另一位印裔作家鲁斯迪（Salman Rusdie）一样，英文几乎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母语。然而也有不少英语作家的母语不是英文，却仍能在苦学后出类拔萃，另一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曾用英文写诗和散文，都是举世公认的杰作。更有名的例子是纳布可夫（Vladimir Nabokov），他的畅销小说《萝丽塔》非但是用英文写的，而且内中掺有不少美国土话，至今还有多少读者记得他的母语是俄文？最近出人头地的中国作家哈金，在美国所享的盛誉，不全是美国题裁所赐，而更得自他的英文文体，经多年磨炼后自成一格，值得效法。

其实，值得华人作家效法的并不是哈金的英文，而是中文。我以上所举的德文和英文例子，只不过说明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本身是须要各种不同的文学才能使它更为丰富；换言之，中文在不同的土壤中理应得到不同的滋润，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花果。在广义的华文世界——正如广义

的英语世界一样——中文应该是同等的。诚然，我的这个论点是基於一种中华文化的世界主义，里面没有任何中心，只有不同的地域。在全用中文的地域——如大陆——生长的作家，当然得天独厚，但我仍然认为文学的语言不能仅靠血缘和环境，而更须要自觉的努力。我甚至认为：即使出身於中文为母语的地区，也未尝不可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来磨炼，在这方面，当然比磨炼英文方便得多。倒过来说，生长在以英语或其他语文为母语的地区，中文更是得来不易，也更弥足珍贵，在这种多元和多语的文化环境中写中文，其所受到的刺激当然也更多。且容我以个人经验为例。

我的背景可能是前二者的混合：生长在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地区（大陆），又在另一个中文地区（台湾）受教育，但却在一个英语地区（美国）深造并任教，因此时常产生语言的混淆：当我用英文写学术文章的时候，脑后仍潜伏了中文的影子，但用中文写作的时候，却往往英语先行，甚至须要先在脑中译成中文后再把“洋味”去掉，才能复归中文本位。然而，我却发现自己的中文有时却较大陆不少学者的中文更清楚，因为他们的文体反而充满了洋味，乃故意引用西洋理论却未经消化的结果。

文学创作当然比学术写作更难，因为没有出色的语言不可能有出色的文学。如果在华人世界中文已经变成多元的华文，文学创作的前景可能较王安忆所说的大陆和台湾小说的情况更复杂。黄锦树在进一步阐释王安忆的论点中提到：现代白话文的参照系统既然属於北方方言，“对于中国之外的南方，在以华文书写时面对的却是苍白贫乏矫揉的白话文，以及难以被驯化的方言（及他族之语），书写的场景於焉便是翻译的场景。对于北方的作家兼读者王安忆而言，那不免拗口生硬而困窘了”。所以，“失却了可以直接摹录的北方方言（语境）之后，不论是华文或中文，都非常仰赖语言的技术”。但“大马华文的问题并不在於它过於技术化。而是技术化得不够……失语的南方因为在书写上一直是中原的边

睡，所以不需要创造语言，所有的写作也必将是在语言创造意义上的写作。”（见该书 76—77 页）。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看法，但又觉得黄教授的论点似乎把“南北”的分野拉得太开了一点。王安忆究竟属于北方或南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和“海派”一向对垒，但从通俗文学来看，则南北早已混为一炉——从包天笑（南方）到张恨水（写的既是北方也是南方），到张爱玲（小说背景大多是上海和香港），其语言的丰富性并不较新文学初期的“苍白贫乏矫揉的白话文”逊色，而再从当今文学创作来看，大江南北海峡两岸的作家都非常仰赖语言的技术。我认为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北方口语的霸权地位，而是语言多元化以后的“标准”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是否也意味着中文不再有好坏之分？我想大部分的作者和读者（包括我个人）都不会赞同这种相对主义的虚无观点，只不过好坏的标准较前更多元、更复杂了，如何梳理这个文学语言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所有文学评论家面临的共通问题，在此无法详论。也许，“第一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的评审，可以让我们直接面对这一个问题，并作进一步的探讨。

对华文文学的三个期望 —— 21 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

彦火（潘耀明）

在全球化的图景下，在“网络信息”沸沸扬扬的时代，21 世纪的华文文学将扮演什么角色呢？随着电脑、电传以及电讯网络的日新月异，华人作家已不再受地域所限制，以往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流行的“中国”或“乡土”的说法，以及“中原/边缘”的主题，似乎已被模糊的地理界线所消解了。上个世纪的中国作家，在现代进程中所产生的追逐“新”的心理，似乎也随着中国文学成功地走向世界（如高行健获诺贝尔奖；大陆及港台作家作品大量被介绍翻译到西方世界）而有所纾解。不错，在后现代的资讯和图像时代，文学已不需要继续作为传达政治的工具、或治疗“国民性”病症的灵验药方，然而，它的地位却比以往更加尴尬，因为它已被大众文化的消费潮流所淹没，与时代不再息息相关。

九十年代后的大陆文学，王蒙、王安忆、莫言、韩少功、贾平凹、残雪、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仍不时有优秀的作品出现，但已不像八十年代常常引起轰动效应，相对而言，年轻一代读者所欣赏的反而是以“身体写作”的卫慧、棉棉等，以及通俗的大众文学。大陆的诗人、作家早已丧失了过去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再拥有史诗式的故事，

不再拥有“启蒙”的力量。先锋文学培植的一批年轻的继承者，虽然坚持与世俗化疏远的姿态，但由於太沉迷於语言和写作技巧的实验，失去了参与社会批判的能力。同时期的港台文学也一样陷入了某种迷失，用王德威的语言，是陷入了“色情乌托邦”。他所说的“新狭邪体小说”，如香港的施叔青、李碧华，台湾的李昂、朱天文和许多“同志小说”，都太执着於末世的虚幻玩世的姿态，虽然在文字上追求唯美，内容却显得苍白了。

当我们展望 21 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时，我首先希望文学能够重新找回本初的位置，不要与社会生活脱离。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回到以前的文学革命或革命文学，而是希望文学能够回到对生命本源和人生困境的思索，重新关怀人的问题，关怀社会问题。虽然，世界华文文学的“本土化”和“地域性”天然地造成了其多样性、多元化特点，这一特点在日趋全球化的时代尤为可贵。但是，世界华文文学也应该寻求共同的人性支撑点，关心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法国著名小说家阿贝尔·加缪，曾时而通过他作品的主人公问道：“我如何才能在毫无意义的宇宙中找到富有意义的存在？”那个时期的他是被虚无主义所吸引，但后来，他转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关心，他问道：“我们怎样才能减少这个世界的痛苦和非正义？”於是他后期特别关怀人类所遭受的空前的苦难，有力地反抗虚无。我想，世界华文文学在这一方面应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个期望就是文化复兴。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白先勇曾经提到的“我们需要新‘五四’运动……需要重新发掘、重新亲近我们的文化传统。”（《明报月刊》1999 年 5 月号）他所提倡的欧洲式的文化复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找回自己文化的源头，才能找到世界华文文学的支撑点。也许港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学比较没有“五四”传统的包袱，但是被“文学革命”洗礼过的中国文学则应该更多地寻回“五四”以前的汉语写作传统。譬如说金庸的写作，最

近被许多国内外学者关注，就是因为他的小说语言是反欧化的语言，他的小说叙事模式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方法，而且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宗教和美学中的精华。再如，受曹雪芹的《红楼梦》影响很深的张爱玲和白先勇的汉语写作都是出类拔萃的。王安忆的《长恨歌》更表现了用汉语写作特异的魅力，这本小说是用纯粹而迷人的语言支撑起来。正如刘再复论述的，文学不可革命，“文学乃是艰苦、复杂、充分个体化的精神性创造活动，而不是颠覆性的革命运动。

文学的继承性是无法从根本上打倒的，任何文学创造都离不开前代文学创造历史的成果和经验。”（《明报月刊》1999年5月号）21世纪的华文文学只有与中国传统建立紧密的关系，才会不失去其文学生命的源泉。

第三个期望是本土性与普世性融为一体。华文文学应立足于本土化的特点，但所谓“本土化”，并不是要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而是在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保持自己的语言特色，保持自己的差异性，借重各个地方特有的历史资源和历史记忆来思考现代文明系统的内在危机，达到与整个人类心灵相通。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在每次写作时，对写作题材的地理历史进行细致的查证，进而研究文化语言，是值得借鉴的。而被瑞典学院推崇具有“普世价值”的高行健的作品，正是最充分地发挥本土汉语的魅力。

总之，在图像信息时代，许多人对文学已不再表示乐观，但我相信，文学并不会死亡，读者比例广大的华文文学更不会死亡。反观世界华文文学如果能够不断作出自我的省视，找到共同的人性立足点与文化立足点，它对处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仍然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的。我觉得将来的华文文学不仅要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进行反思，而且还应该对现代文明危机进行反思。毕竟，文学是人学，应该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

文学奖的争议与执行

——世界华文文学领域探讨与展望

张错

有关文学奖的争议，人言言殊。其实文学奖乃是文化产品，文化地域本身变迁与风貌，都影响着对所谓“奖”本身的评价与标准。本文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检讨文学奖正反两面辩证，以及如何执行等三种角度。第二部分探讨华文文学领域定义，并展望其未来整合与位置。

无论每一项奖的产生，都应代表某种公信力下不容置疑的荣誉与确认。这种荣誉制度，往往来自两种方式。一是由比赛产生，优胜劣败。另一是迟来祝福，以“奖”的荣誉来追认得奖人成就。观诸今日各类文学奖的颁发，又以前者最受注意而具活力，因为大部分以竞争而产生的文学奖，都来自报刊杂志或文学团体的年度活动，甚至经常以巨额奖金作为招徕。许多这些媒体本身就具有庞大活动范围(outreach)更增声势之盛。在甄选程序后，往往更在期下副刊或刊物公布评审讨论内容，使竞选者的主观与阅读者的客观达到某一程度的调和。同时更见微知著，在评审诸公的眼中，得知优劣的取舍。

如此在文学启蒙而言，确能带动文艺风气，使文艺青年在一种荣誉及成就感的驱使下，走入竞技场，希望一朝殿试抡元，以奖的光荣，来证明多年从事文学的苦心努力没有白